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2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5012-6701-9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88号

| | |
|------|---|
| 书 名 |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i Ji |
| 编 者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
| 责任编辑 | 罗庆行 |
| 责任出版 | 赵 玥 |
| 责任校对 | 陈可望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
| 网 址 | www.ishizhi.cn |
| 电 话 | 010-65233645(市场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开本印张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6%印张 |
| 字 数 | 308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6701-9 |
| 定 价 | 8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赵卫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左希迎 | 中国人民大学 | 石源华 | 复旦大学 |
| 卢光盛 | 云南大学 | 归咏涛 | 北京大学 |
| 包霞琴 | 复旦大学 | 关培凤 | 武汉大学 |
| 祁怀高 | 复旦大学 | 李皖南 | 暨南大学 |
| 杨健 | 复旦大学 | 杨鲁慧 | 山东大学 |
| 吴心伯 | 复旦大学 | 吴寄南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 [日本] 青山瑠妙 |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 | |
| 周方银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赵卫华 | 复旦大学 |
| 赵可金 | 清华大学 | 赵青海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
| 赵明昊 | 复旦大学 | | |
| 钟飞腾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 | |
| 费晟 | 中山大学 | 夏立平 | 同济大学 |
| 郭锐 | 吉林大学 | 薛松 | 复旦大学 |
| 魏玲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主任 温尧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mc@fudan.edu.cn

电话: 86 21-6564 2939

传真: 86 21-6564 2939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赵卫华 / 1

周边形势

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 杨晓萍 / 1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

地方外交在中国—文莱合作中的角色与展望..... 罗传钰 支鹏宇 / 33

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
——以2016—2017年中韩关系为例..... 方炯升 / 51

周边国情研究

大变局背景下越南的对外战略与政策走向探析..... 顾强 黄坚 / 81

从越南涉南海话语宣传看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 阳阳 / 104

论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外交——以文在寅政府执政前期的斡旋为例
..... 李家成 张翊梁 / 121

新冠疫情下的地区问题

《贸易联系与供应链韧性：应对新冠疫情新常态》（节选）
.....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学者 / 15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政策的扩散——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杨嘉宜 / 180

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东盟关系30年与中国周边外交发展..... 郭志奔 / 205

会议综述

第十一届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张 婷 / 229
第五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泽宇 / 238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4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4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51
审稿专家致谢..... / 256

Contents

Preface..... *ZHAO Weihua* / 1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and U.S.-India Interaction
..... *YANG Xiaoping* / 11

Research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Role and Prospect of Local Diplomacy in China-Brunei
Cooperation *LUO Chuanyu and ZHI Pengyu* / 33

A Missing “Honeymo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
tries—A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in 2016–2017
..... *FANG Jiongsheng* / 51

Research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alysis of Vietnam’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Dir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Change *GU Qiang and HUANG Jian* / 81

Research on the Hedging of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from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YANG Yang* / 104

A Study on ROK’s Mediation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Take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s Me-
diation in Its Early Years as an Example
..... *LI Jiacheng and ZHANG Yiliang* / 121

Regional Issu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 Trade Linkages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Navigating the COVID-19 New Normal* (excerpt)..... NACAI scholars / 151
- The Diffus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ory YANG Jiayi / 180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Thirty Years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GUO Zhiben / 205

Reviews on Symposiums

- Review on the Eleventh Fudan Symposium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ANG Ting / 229
- Review on the Fifth NAC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ZHANG Zeyu / 238

Appendix

-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 Fudan)..... / 247
-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49
-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51
- Acknowledgements to Reviewers..... / 256

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

杨晓萍

【内容提要】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武装”印度，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在对印度的战略定位上，美国游离于“摇摆性国家”和“领导性国家”之间，这使美印战略关系在本质上存在限度。就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馈而言，主要遵循在顾及“中国因素”的前提下，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反应型”策略，包括观望期对中美双领导的担忧，以及调试期的“谨慎积极”战略组合。美印战略互动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驱动，遵循“美国主导、印度修正”的逻辑。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美国“印太战略”演进的方向，决定了美印战略合作的大框架；二是印度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机遇”的判断，将一定程度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作为实力弱的一方，印度试图在中美间实施“巧撬动”，从而使基于“中国因素”的美印互动具备了形成“中美印”闭环互动的潜质。

【关键词】“印太战略”；中国因素；美印互动；认知反馈；互动逻辑

【作者简介】杨晓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一般认为，在基本时间轴上，美国的“印太战略”萌芽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别是第二任期），成形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并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虽然各国对“印太”概念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的出台，更使“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各国在评估战略环境时的一个大的叙事背景。

美国的“印太战略”遵循一个基本逻辑，即通过“武装”印度，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从而帮助维持美国霸权。“中国因素”是促使美国提升印度的战略重要性的重要驱动。就印度而言，“中国因素”的表现更为复杂。一方面，印度在争做“大国”和成为“领导性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是其重要参照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产生的地缘影响，使印度在叙事上更趋向于将“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威胁”。随着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印”能否形成一个完整互动的闭环，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将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因素”视为常量，通过细化考察美国“印太战略”演进中基于“中国因素”评估基础上对印度战略定位的变化，以及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演进的不同阶段，在对“中国因素”有所顾及的情况下，对美国“印太战略”所做出的认知及反馈，归纳美印战略互动的起点和路径。同时，通过对美印战略合作的利益进行匹配，探寻美印战略互动中的“主次方”及其互动逻辑。最后，通过对美印战略互动中一些“看似冲突”维度的探讨，解释何种条件下“中美印”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闭环，以及其可能的政策含义。

一、研究问题及文献综述

虽有研究表明，从2013年始，印度就开始寻求一种中美印三边互动的范式，^①但当前学界主流意见并不认为中美印战略互动是一个完整的闭环。随着印度的崛起，学界更多从“中美印三边关系”或“战略三角”的角度来探讨中美印之间存在的互动状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相互影响说。如张贵洪就认为，“冷战时期，中美印的互动主要集中于南亚。冷战后，随着中印的崛起，中美印三国间的互动显著增强，任意两国间的关系都深深地受到第三国的影响”。^②（2）不结盟、非对抗说。如曹德军认为“中美印是以不结盟为核心的不对称三角博弈”。^③慕永鹏也认为，“中美印三边关系具有非对抗性，

^① 参见林民旺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林民旺：《南亚局势以中印美互动为核心内容发生新变化》，《世界知识》2021年第15期，第30—32页。

^② 张贵洪：《中美印三边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第20页。

^③ 曹德军：《中美印不对称三角关系的“信任—权力”分析》，《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128页。

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和摩擦”。^①（3）特定国家改变说。如司乐如认为，“21世纪，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国是最大的改变方……而中国则尽量避免美印联手对付中国态势的出现”。^②陈建山认为，“在中美全方位博弈下，中美印三角的枢轴国家由原来的美国转变为印度”。^③

这些研究成果较清楚地帮助我们还原了中美印互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并对当时的互动状态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知识谱系积淀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并不涉及对中美印互动的逻辑起点、路径和逻辑的探讨，从而较难真正厘清三国间互动的关系。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形及发展，更多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因素”视为一个常量。这主要是基于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即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常态”。^④随着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及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夯实，中美两国“不仅在实力对比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且美国将越来越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本身为其直接战略目标，与其他国家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服从美国对华战略而不是相反”。^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战略互动的形态及性质是影响美印互动的根本出发点。

当前国内对中美战略互动的形态及性质，特别是如何理解中美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以下观点。如吴心伯提出，“竞争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中美竞争型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⑥中美竞争型互动关系的结局更可能是“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⑦而不同于中美“领

① 慕永鹏：《中美印三边关系：形成中的动态平衡体系》，《国家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第17页。

② 司乐如：《美印中三角关系互动与国际格局》，《当代亚太》2007年第10期，第40—41页。

③ 陈建山：《中美印“战略三角”新变化及趋势分析》，《学术探索》2020年第2卷，第79页。

④ 最早论证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研究员，其在2016年出版的《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中美关系“新常态”概念。随后，林利民、林东晓在《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中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工具性下降、目标性上升。

⑤ 林利民、林东晓：《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⑥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00—105页。

⑦ 吴心伯：《中美权力转移的第三种方式》，载张蕴岭主编《东亚评论》2019年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第9—13页。

导地位之争”^①“潜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之争”^②及“多维度竞争”^③。楚树龙认为，“美国把中国定位成‘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使竞争与合作成为新中美关系的‘双重结构’……突出竞争，放低合作，是中美关系出现的结构性改变”。^④在管理中美战略竞争上，刘丰提出：“明确界定彼此的合理利益范围、对不同领域的竞争规则展开磋商、避免竞争的意识形态化以及避免在全球和地区层次排他性的竞争，应成为中美战略界塑造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的共识。”^⑤这些对中美竞争型互动关系的本质及前景的理解，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下影响美印战略互动的逻辑起点。

在此基础上，对于美国“印太战略”下美印互动的演进逻辑，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美国决定论”^⑥的解释范式。其逻辑支撑点是，鉴于美国是全球性霸权国家，“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印太”地区国家战略转型和策略选择的关键性因素或“自变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带来了印度等后续连锁反应，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优先项决定了美印战略合作的主要领域。这种解释范式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另一种解释是对“美国决定论”的一种补充，试图从印度的威胁感知^⑦、合作动机等角度论证印度对美国的反向影响作用。但这种视角的研究目前在数量和影响力上均不是主流。大致而言，这两种解释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对美印战略互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进行了区分。

① 贺凯、冯惠云：《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和共享》，《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40—46页。

②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

③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51—74页。

④ 楚树龙、陆军：《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25页。

⑤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26—27页。

⑥ 相关研究如韦宗友：《美国印太战略新发展、新趋势及其影响评估》，《人民论坛》2020年第7期，第13—18页；陈积敏、冯振男：《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期；张家栋：《美国“印太”倡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3期；朱翠萍：《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

⑦ 相关研究可参见何达、需晏清：《印太战略视阈下台湾当局对美政策：动机、途径、误区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1期，第56页；杨晓萍：《新时期美印关系：威胁感知与利益权衡》，《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6期。

在学理上，美印战略互动还涉及对“制衡均势”^①的探讨，因为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是最有潜力在此地区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国家。胡仕胜就认为，在美国因素常态化的前提下，“中印两国战略目标诉求的排斥性、战略需求互补的趋弱性、两国大国诉求的紧迫性以及分歧管理的不可控性，降低了中国与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同质性，增加了竞争性，导致中印合作型互动动力不足”。^②这表明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主动拉住印度对中国进行制衡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效果。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较清晰地探寻了美印战略互动的驱动、非对称性及效果。然而，少有研究涉及讨论美印战略合作中的“中国因素”如何驱动美印战略互动向中美印战略互动演变。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美印互动的起点及美国对印度定位的摇摆性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的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中国视为促进美国利益优先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的重要合作伙伴，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全面的关系”。^③虽然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成为奥巴马政府处理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地区问题优先性的指导性原则，但奥巴马政府非常“小心地”淡化“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遏制中国”的成分，并称“与中国在降低碳排放领域取得的成果是突破性的”。在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也提道，“美国在与盟友深化安全关系的同时，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在南亚将积极深化与印度的战略和经济关系，并在反恐等领域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展合作”。^④由此可见，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将美国对华战略内嵌于其地区战略中的设计，印度和中国同属亚太纬度。美国对印度的定位更趋向于地区强国，对印度主导作用的肯定也更集中于南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巴马时期美国官方从未正式承认其“亚太再平衡”

① 除了贺凯的系列文章，还可参见刘胜湘、辛田：《制衡均势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轮析》，《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② 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20—22页。

③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p. 43.

④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5, pp. 12, 24-25.

战略中“遏制中国”的谋虑，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提升美印战略关系、推进“印太”概念的坚定支持者。早在2010年，她在夏威夷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印太”地区对全球贸易和商业至关重要。2011年，她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金奈发表演讲时称，“在金奈，遥望孟加拉湾及东边的东亚、东南亚，印度应考虑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建立领导地位……美印的共同利益驱动我们必须确保亚太的地区架构能够解决我们的关注，并产生实质的结果”。^①媒体也多认为，这是美国欲“借力印度制衡中国”。^②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在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定位成修正主义国家^③、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战略竞争者，并认为“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关于自由的世界秩序或压制的世界秩序之争”。^④这种定位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由此，中国成为美国需要制衡的对象，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发展成一个将中国与其他地区国家严格区分开来的战略设计，而印度成为最有潜力在“印太”地区帮助美国实现地区力量平衡的关键一环。

拜登上台后，在2021年初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同年4月，美国参议院又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法案建议，在2022—2026财年，美国向“印太”地区提供总共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同期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和相关项目提供总计4.5亿美元的资金。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继承和确认。

简言之，统观美国“印太战略”从酝酿到成形再到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逻辑，即通过“武装”印度，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国内有研究甚至认为，“印度处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支点位置，有可能同时撬动日本、东盟、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中国”。^⑤这种对印度地缘战略价值的肯定，主要源于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印度在地理上恰恰位于连接印度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0, 2011,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7/168840.htm>.

② 《希拉里促印争当亚洲领头羊》，凤凰网，2011年7月22日，<https://news.ifeng.com/c/7fa28fUnpBU>.

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④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7, p. 45.

⑤ 连波：《摇晃的“楔子”：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战略行为探析》，《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8页。

洋、太平洋海域的中心，这与美国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战略集中区域重合；二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上越来越感到自身在资源、能力甚至感召力上的限度。鉴于印度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体量和潜在增长实力，它将是最有潜力帮助美国制衡中国、维持霸权的国家。在美国看来，“崛起的印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印度融入印太区域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可以显著改变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①

上述思想反映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以及各个职能部门如国防部、国务院^②制定的有关“印太战略”的文件，在定义威胁、目标、动机、路径上都阐明了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

表1 载有“印太战略”的美国文件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

| | 目标 | 威胁 | 动机 | 路径 |
|-------------------|-----------------------------|---------------------------|--|--|
|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维持在“印太”地区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 | 中国和俄罗斯 | 地区大国间力量的失衡会产生全球影响，从而威胁美国利益 | 通过信守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并增强与他们的合作，增强美国的实力，扩展美国的影响，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 |
|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 维持美国在“印太”的战略优势；强化美国同盟体系的有效性 | 中国在“印太”地区建立的“非自由”的影响力投射区域 | (1) 美国在“印太”地区优势地位的丧失会损害美国维护全球利益的能力； (2) 中国正在全维度损害美国利益 | (1) 同盟与伙伴关系更新；(2) 加快印度的崛起和综合能力建设； (3) 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上打压中国 |

^① Gen Herbert J., “Advancing U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1, no.1(2018): 11.

^② 作为对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的补充，国务院的战略报告更加侧重于“印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详见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续表

| | 目标 | 威胁 | 动机 | 路径 |
|-------------|--------------|-----------|--|---|
| 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 | “自由、开放”的“印太” | 中国、俄罗斯、朝鲜 | 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使中国在“印太”地区追求国家利益时，更有能力应对与其他国家的冲突 | (1) 与盟友合作强化以“获胜”为目标的军事行动的战备性，从而迫使竞争者只能遵从地区规则；(2) 盟友体系更新，伙伴关系扩容；(3) “三边”“多边”的网络化伙伴关系 |

在这些官方文件中，印度在美国战略规划中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提升。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印度是全球领导力量，是印度洋及更广泛区域的安全事务领导者”。^①2018年，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黄之瀚（Alex N. Wong）在就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做特别简报时表示，“之所以将亚太地区的战略命名为印太战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在亚太、东亚和南亚地区领导地位的认可，并表示美国将从政策上支持印度在前述地区的发展，确保印度在该地区发挥关键性作用”。^②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推进各方共同愿景》报告提出，“美国认为印度未来会在印太地区发挥关键作用”，并称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的防务合作伙伴”及“能源合作伙伴”。^③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印度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涉及“制衡均势”的一方。虽然美国对印度的言语表述已经多次落实为文字上的“领导性国家”，这或是出于对印度给予“口惠”之便，但从关系逻辑上看，美国并未排除对印度作为“摇摆性国家”的内在认知。这或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内在限度的最大根源。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46, 60, <https://in.usembassy.gov/U-S-india-relations-building-durable-partnership-21st-century/>.

^② Alex N. Wong, “Briefing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pril 2, 2018, <https://2017-2021.state.gov/briefing-on-the-indo-pacific-strategy/index.html>.

^③ Bureau of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3, 2019, p. 9.

三、印度对“中国因素”的顾及与“反应型”策略

就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馈而言，主要遵循在顾及“中国因素”的前提下，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反应型”策略。这主要包括观望期对中美双领导的担忧，以及调试期的“谨慎积极”战略组合，其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印度成为“领导性”国家的身份诉求。

（一）“观望”期的担忧：在中美两国间对冲

在奥巴马时期，虽然美国也将印度定性为“不可或缺的伙伴”，且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也表现出了对于美印关系发展的极大兴趣，但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投入并不大。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定义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向美国提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因而在印度战略界，更多弥漫的是对中美双领导或“中美双领导”（G2）的担忧，加之2013年时任印度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在纽约被警察扣押事件的负面影响，印度国大党政府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更多的是怀疑和不确定。

在印度战略界，对“印太”概念和倡议的关注大致开始于21世纪初。就公开发表而言，有研究认为，“2007年印度学者第一次将‘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提出，认为‘印太’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①这实际与美国认为的“印太”是从美国太平洋沿岸到东亚有所区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西方发展模式备受质疑的背景下，“金砖”概念及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印度的自信心也大幅提升，对外投射影响力的内在需求也有所增加。2012年，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演讲时首次提到了“印太”，并且表达了对稳定的“印太”区域重要性的认可。这被认为是“印度官方在2012年正式采用‘印太’这一概念”^②的主要证据。

2014年莫迪上台后，在“印太”概念逐渐得到地区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的官方跟进后，印度的外交话语中也开始频繁使用“印太”一词，印度开始逐渐接受“印太”概念。对“印太”概念的接受与印度谋求成为“独特的”领

^① 主要证据是印度国防和分析所研究员库拉纳发表的《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前景》一文。详见龙兴春：《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印度的考量》，《学术前沿》2019年第4期，第68页。

^② 李渤：《印度“印太战略”认知的影响因素：安全理念与安全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72页。

导型国家的定位有关。莫迪在第一任期，对内谋求经济发展，试图建立一个“繁荣而稳定的社会”；对外则受“大国宿命”观念的影响，积极扩展经济和战略联系。印度不仅在南亚实行“邻国第一”政策，而且以联通和重新开发印度东北部为契机，谋求将“东看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

有研究认为，在具体战略目标上，除了确保海洋安全，进一步与东南亚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东向行动”在深层次上还有以此来有限平衡印中关系的考虑，即“随着中印战略差距的扩大，印度只能通过维系内外的力量平衡来缩小差距”。^①这在深层次上与印度的威胁观相关。“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感知主要包括边界、巴基斯坦、核问题、中国在南亚上升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扩张……基于这些议题，印度总在采取不同形式的对冲，或者说需要进行对冲管理。”^②

然而，另有研究认为，印度“东向行动”的最主要驱动力仍是经济因素，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东南亚的商业和贸易联系，助力自身的繁荣与发展。“东向行动”为印度东北部各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从而有助于形成以印度东北部为核心的印度与邻国地区的发展框架。^③在地区架构上，印度也更强调“东盟中心”，谋求“建立一个自由、包容的地区架构，虽然并不排除印度有制衡中国的考虑”。^④

由此可见，尽管澳大利亚在2013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印太战略弧”，而日本也在2016年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但印度在进行“东向行动”的战略设计时，仍“有意”保持了该战略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这是由于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印双边经济关系在21世纪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迅猛发展，并在2014年达成了《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重申拓展经贸合作的决心，并在诸多多边机

① 余芳琼：《“印太”语境下的印度东向外交》，《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2期，第58页。

② Hoo Tiang Boon, “The Hedging Prong in India’s Evolving China Strate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101 (2016): 795-799.

③ Sarma Atul, Saswati Choudhury, *Towards a Perspective on the Look (Act) East Policy and Northeast India: Mainstreaming the Northeast in India’s Look and Act East Policy*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1.

④ Harsh V. Pant, Avantika Deb, “India-ASEAN Partnership at 25,” ORF,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asean-partnership-at-25>.

制中开展密切协调与合作。

与此同时，在“印太”概念被印度官方频繁使用的背景下，莫迪上台后，也开始以民主为抓手，逐渐强化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战略和安全联系，开始加重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2015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印度时，双方发表了《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的共同战略愿景》，强调“共同推广共同的价值观”，^①莫迪总理“甚至建议恢复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松散的、基于价值观的安全网络”。^②这既是为了显示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独特性”，也是为下一步继续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出反应开拓空间。部分研究认为，“印度在多边外交层面，试图在‘民主同盟’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间左右逢源。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对冲性增加”。^③

大致而言，在美国还没有出台成型的“印太战略”的萌芽期，印度更多是对“中美共治”感到担忧，从而选择同时与中国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奥巴马时期，美印关系也经历了“蜜月期”，双方在空间技术、化学工业、制药以及维和等方面有广泛合作。“观望”是当时印度依据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选择。在学术表述上，一般认为，在观望期，“对冲”是成本—收益最高的策略选择。

（二）成形期的“调试”：“谨慎积极”下的战略组合

在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多次使用“印太”概念之前，同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就通过了一项题为《增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的议案，并表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④这表明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在美国国内已经具有一定共识。

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以后，“印太”正式代替了“亚太”。随后，美国官方关于“印太战略”构想的阐述不断增多。2018年6月，

^① The White House, “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January 25, 2015.

^② Siddharth Varadarajan, “China or U.S.? India Must Have a Master Strategy in This Poker Game,”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29, 2015.

^③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87页。

^④ 参见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8：“印太”理念能否成为特朗普亚洲政策的基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7页。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声称美国“印太战略”的四个要素包括：（1）加大对海洋空间的关注；（2）强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3）加强法制、公民社会和透明治理；（4）提倡市场引领的经济发展。^①同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报告，阐述了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治理和安全三个方面的诉求及重点。这就是，在经济上，促进繁荣，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上的合作；在治理上，强调促进透明性、公开性、法治、释放私人投资及打击腐败；在安全上，强调确立地区和平与安全秩序，保护共享资源和维护主权（诸如促使朝鲜无核化、维护东海和南海的航行自由、防止极端主义蔓延等），在“印太”地区推进国防产品和服务的直接商业销售等。^②从解密的材料看，2018年特朗普政府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构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石。而随后的系列报告，只不过是对其框架的具体细化及对部门工作重心的说明。

对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出台的“印太战略”，印度“形成了以‘谨慎的积极’为主要特点的战略行为”。^③所谓“谨慎”，最明显的例证是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达的对“印太”的构想与美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1）对“印太”强调包容和开放。莫迪总理明确指出，“印太”不是遏制性同盟，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并特别提到当印度和中国合作时，亚洲的未来会更美好。（2）印度的“印太”强调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这与美国强调自身在维护和构建地区秩序中的领导作用不同。^④

所谓“积极”，最主要的表现是，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后，印度开始积极、稳健地夯实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安全防务关系。其背后的主要逻辑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提升了印度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权重，从而使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更有可能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拓展自身处理印中双边关系的空间。在这种逻辑之下，传统的中美互动变成了中美印互动，印度的战略主动

① Terri Moon Cronk, “Alliances, Partnerships Critical to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Mattis Says,” <https://dod.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538620/alliances-partnerships-critical-to-us-indo-pacific-strategy-mattis-says>.

② “Advancing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8/11/287433.htm>.

③ 连波：《摇晃的楔子：美国印太战略下印度战略行为探析》，第8页。

④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tn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性大大提升。

具体而言，印度在安全上靠近美国最直接的证据是四个基础性军事协议的签署，而这些举措在印度看来有利于实现其“安全净提供者”的定位。早在2002年，出于反恐和印美联合军演增多的需要，印美两国就签署了《常规军事信息安全协定》(GSOMIA)，允许双方在彼此保护对方秘密信息的前提下，分享军事情报。2016年，美国在防务上被升格为“主要防务合作伙伴”，两国还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允许两军使用彼此的陆海空基地进行补给。

特朗普执政期间，2018—2020年美印两国完成了四个基础性军事协议中最后两个协议的签署，即《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及《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BECA)。《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的签订更使美国与印度可以共享卫星和其他传感器数据，进一步提高印度军队的定位和导航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的签署时间是在2020年9月(美国大选前)的美印“2+2”对话期间，明确传递出双方均认为美印战略关系将不受美国政府更迭影响的明确信号。

大致而言，“谨慎积极”指导思想下，印度的战略组合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对冲

首先，在大国间维持“两面下注”。美国的“印太战略”出台后，印度在提升与美国战略关系的同时，仍在军事安全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和俄罗斯保持着沟通与协调。最典型的是，2018年后，印度在美印战略关系全面提升的同时，大幅增加了与俄罗斯的军火贸易。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购买价值50多亿美元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显示出印度有意维持所谓的“战略自主”传统。

其次，在机制上谋求“制度制衡”。虽然“制度制衡”^①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目前还存在争论，但印度在深知“四边机制”是美国“印太战略”最主要抓手的情况下，继续谋求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机制框架下与中国的合作。

最后，在身份上寻求“无缝切换”。印度试图根据不同议题，选取对自身有利的“身份标签”。一方面，印度在安全、战略和价值观上加入“民主国家”联盟。另一方面，印度又在发展和全球治理上进行“新兴经济体”合作。莫迪

^① He Kai, “Contested Region Orders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 no.2 (2015): 212.

上台后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大国外交，但也对系列“中等强国”发力，提升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尼的战略和安全合作，并寄希望于通过“中等强国联盟”来推进世界的多极化。

2. 制衡

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在“印度制造”的口号下，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此背景下，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印度以“国家安全”名义将“中国威胁论”合理化，持续推进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脱钩”，并积极配合美国“去中国化”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印度采取的相应主要措施包括：（1）限制中国投资。2020年4月，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更新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将中国从“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这意味着之前很多可以直接操作的申请，现在必须事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审批。（2）直接禁用中国共224款APP。这基本上禁止了中国大部分相关企业在印度发展的途径，以阻断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盈利。（3）在贸易上，逐步减少中印双边贸易额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2020年4—6月，中印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23%，从214.2亿美元下降到165.5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从2020年同期的131亿美元降至54.8亿美元。

3. 有限冲突和对抗

自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政府一方面在言语上主张对华友好合作，另一方面却始终在争议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控制，导致中印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2017年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外交中的“示强”成分加强，莫迪政府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政策，从而使中印关系面临冲突甚至军事对抗的局面。2020年6月15日爆发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更将中印关系推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的最低谷。

一般认为，2017年洞朗事件是观察印度外交思维转变的关键节点，其也是印度政府制造的一场中印双边危机。戏剧化的是，这场长达72天（2017年6月18日至8月28日）的对峙在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前突然结束。在具体时间轴上，这场对峙是在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前被批准的，而印度媒体也在莫迪访美期间大肆报道洞朗对峙危机，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基本接受印度的“叙事”。印度媒体的表现实际表明印度政府有意借中印“有限冲突”来表明印度向美国靠拢的意图，从而使“美日等对华充满战略疑虑的国家深信，印度是他们可以信赖并可以用来制衡中国战略崛起的战略伙伴，继而为印度崛起赢得美西方及

其同盟体系的更加专注而持久的战略投入”。^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的“印太战略”成型于特朗普执政时期，但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也奉行“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主动退出多个国际机制，并在经贸问题和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问题上奉行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因而，对印度来说，特朗普总统本人或是美国“印太战略”推进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印度通过选择多重战略组合，应对成形的美国“印太战略”。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战略，使莫迪执政以来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不结盟向多向结盟的转变”，^②也使新时期的中印互动呈现出波动性特征。这或可被看成美国“印太战略”成形期的结果，也是印度对外战略不断调试的结果之一。

四、从“美印”到“中美印”：美印互动的逻辑及前景

美国“印太战略”的根本逻辑是“借印制华”。以此为出发点，对美印互动路径的探寻离不开对“美国主导性作用”的探讨，因为“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印太”地区国家战略转型和策略选择的关键性因素或“自变量”。美国“印太战略”核心要素层面的推进，框定了美印在军事、经济和机制等维度上战略合作的具体内容。当前研究也表明，的确存在一条较为清晰的“美国涟漪式”影响印度的路径。从这个层面看，美国在“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

就印度的作用而言，印度自身对“领导性大国地位”的追求、印度在“战略追随”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摇摆、美印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上的偏差以及印度自身根据国家利益权衡而在地区热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则使印度的认知及策略选择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形成一种修正和反馈，并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

因而，我们可以将美印战略互动的逻辑概括为“美国主导、印度修正”。在这种逻辑下，未来美国“印太战略”演进的方向将决定美印战略合作的大框架；而印度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机遇”的判断，将一定程度上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

^① 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12页。

^②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

根据《美国印太战略框架》，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亟须解决的战略困境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在维持美国的“印太”地区战略优势地位、促进自由经济秩序的同时，防止中国建立新的、“非自由的”势力范围，并能为了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在不完全排斥中国的情况下，培育与华合作的领域。二是如何在促进公平、互惠贸易的同时，强化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

美国语境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实质是一种“拒优”战略，即不能容忍中国比美国更强。这首先涉及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在经济领域造成的威胁，其次才是由经济实力、行为范式带来的所谓对美国领导地位和地区秩序的挑战。拜登上台后，在2021年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也提出，“中国是唯一具备经济和军事等实力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美国的目标是对中国进行可信的威慑”。^①然而，在具体操作上，拜登政府将这两种威胁通过“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统一打包成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并以此为旗号，寻求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及伙伴间的合作。

理论上讲，美国面对中国在经济秩序上所形成的挑战，一般有两种应对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考虑到自身内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自身实力无法在短时期获得“质”的提升的前提下，采取“以打压对手为主”的战略。这种策略不考虑是否一定程度上对自身利益造成伤害，只需要对方损失比自己大，就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战略。典型的代表如特朗普时期对华发动的“贸易战”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仍然积极推动的“经济脱钩”和“产业链脱钩”。这种路径实际释放了两个清晰的信号：一是美国对自身内部改革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通常所说的美国政治社会的极度撕裂；二是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审慎乐观”。自信的国家从不选择“损人不利己”的策略。这种策略的选择也跨越了国家间正常竞争的边界，损害了中美间的战略互信，有损于全球超级大国的国际声誉，有非常负面的“榜样”示范效果。

第二种路径是“以我为主”的战略，即夯实美国自身实力，包括继续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保持绝对领先，如在军事安全关系上，修复与盟友关系，拓展新的战略伙伴；突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标榜美国行为的正义性，并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性”因素作为动员朋友的“武器”和润滑剂。以反腐败、

^①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pdf>, pp. 19-22.

财务透明为名，污名化中国等。与此同时，尽量补齐自己的“竞争短板”，如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等。特朗普时期实行的诸多“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有“补齐短板”的考虑，但努力方向存在问题。

如果拜登时期美国“印太战略”遵循“以夯实自身实力”为主的原则，那么中美或可在一些具有共同利益领域（如气候变化和环保）尝试进行合作，而且会在深层次上影响美印战略合作的力度。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下的美印战略合作，必须考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因素”可能对美印战略互动带来的影响。

在所谓的中美印三边互动中，印度其实更容易受中美关系“微弱回调”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印太战略”萌芽期间印度对于可能出现的“中美双领导”的担忧，也表现在2017年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前中印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还表现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期间印度对华实施“极端制衡”策略，这更像是向美国推进“印太战略”递交的“投名状”。2020年10月至今，或是由于受国内疫情影响，或是由于处于等待与评估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时期，印度政府对华政策主要选择对冲、软制衡及有限度接触。在2021年7月14日中印两国外长的会晤上，印方仍表示，“感谢中方对印方举办金砖活动给予的支持……印方没有也不希望改变对印中关系的战略判断”。^①

因而，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对所谓的“中国因素”面临一个近乎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印度对华战略疑虑的加深促使印度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加重。在特定时期，印度对华外交的“投机性”也大大加强。例如，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印度加强了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将印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达成《后勤支援协议》和《科技实施协议》等。印度还与日本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国军队可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而美国也通过美印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向印度提供中印边境地区的中国兵力部署情报。

另一方面，即使印度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仍无法“人为”阻断或放弃中国为印度成长和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经济是印度实现大国崛起的根本途径。疫情暴发初期，印度政府有意识地降低从中国的进口，并试图缩减中印贸易的规模。然而，2020年中印贸易额在疫情期间仍达到777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

^① 香港中通社《王毅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关注两国边境问题》，2021年7月15日，<http://www.hkcnahk.com/content/2021/0715/905960.shtml>。

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还是在当前中印政治关系受挫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虽然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也表示，将制订计划吸引跨国公司把全部或部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至印度，并向撤离中国转投印度的企业提供补贴。然而，受制于劳工、土地、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制约，实际推进效果并不乐观。中印人为“产业链”上的脱钩，在现实中无法扭转经济依存的内生逻辑。

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首次线下首脑会议举行。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涉及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基础建设、贸易及网络等。这表明，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实现从特朗普时期的概念炒作和蓝图谋划（如弹性产业链计划、清洁网络计划、高质量基建规划、蓝点网络计划等）向具体实操阶段迈进。

在未来，美国的议程偏好仍是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进行战略合作的主导性因素，而印度自身基于成长为“领导性国家”的一些核心国家利益需求，包括能源、经济发展、防务甚至网络等基础设施发展，将成为影响美国“印太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作为实力较弱的一方，印度试图在中美间实施“巧撬动”，从而使基于“中国因素”的美印互动具备了形成中美印闭环互动的潜质。“中国因素”既是美国“印太战略”和美印战略走近的催化剂，也可成为影响印度外交“回调”的动因。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and U.S.-India Interaction

YANG Xiaoping

Abstract The basic logic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y “arming” India. In terms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is caught between a “swing state” and a “leading state”, which makes the U.S.-Indi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inherently limited. In terms of India’s feedback 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t has mainly followed a “reactive” strategy at different stages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ina factor”. This includes a wait-and-see period for G2 concerns and a “cautiously proactive” strategic mix during the debugging period. The U.S.-India strategic interaction is strongly driven by the “China factor” and follows the logic of “U.S.-led, India-amended”. This brings two results: first, the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determines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U.S.-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second, India’s judgment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ll, to some extent,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a weak party, India tries to implement a “tricky p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U.S.-India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China factor” has the potential to form a “China-U.S.-India” closed-loop interaction.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U.S.-India interaction; cognitive feedback; interaction logic

Author YANG Xiao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Research Office of China’s Periphery and Global Strateg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